



二十世纪的 敦煌学

Dunhuang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郝春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世紀

的

敦煌學

Dunhuang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郝春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二十世纪的敦煌学 / 郝春文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325 - 4521 - 0

I. 二... II. 郝... III. 敦煌学—文集
IV. K87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4279 号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T0404

责任编辑: 袁欣瑜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王建中

二十世纪的敦煌学

郝春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125 插页 5 字数 177,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300

ISBN 7 - 5325 - 4521 - 0

K·907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本书所收文章,大部分曾经发表过,此次结集时,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或调整。从内容来说,这些文章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三篇。《敦煌》一文,是我为《敦煌学大辞典》撰写的被置于卷首的词条。该条简要介绍了敦煌自古至今的历史。《试论古代敦煌兴衰之因》,对古代敦煌兴起、兴盛和衰落的原因做了初步分析,可作为《敦煌》一文的补充。《古代敦煌文化的特点》,简要介绍了我对敦煌文化特性的认识。希望通过这三篇文章,可使读者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即可概括了解敦煌的历史概况、兴衰之因及其文化特征。

第二组四篇。这四篇有三篇是回顾与评述二十世纪敦煌学的,但各有侧重。《二十世纪的敦煌学》是我为研究生课程班讲授敦煌学的讲稿,此文除全面介绍了上一世纪敦煌学的发展概况,还对莫高窟、莫高窟藏经洞、藏经洞出土文献与文物的流散和敦煌的历史等做了简要的介绍。《二十世纪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整合我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1期)和《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之“敦煌学”部分两文而成。前文是应《历史研究》之邀撰写的回顾二十世纪学术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主要回顾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情况；后文是应《二十世纪唐研究》主编之约，侧重介绍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情况。此次将两文合在一起，删除了重复的部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研究述评（1938—2006）》，是我所写的专题性学术回顾文章。这三篇文章是本书的主体，所以，我把这部书命名为《二十世纪的敦煌学》。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介绍虽以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为主，但也包括了二十一世纪以后的重要成果。

这一组还收录了我在1997年撰写的《关于唐史研究者与敦煌文献研究者“分流”的问题》（发表在内部刊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7年第1期）一文，此文期望唐史研究者增强利用敦煌文献的意识，同时企盼敦煌文献研究者为唐史研究者利用敦煌文献提供更好的条件。因当年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以这篇文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组是我所写的关于敦煌学论著的九篇书评。当然，我所评论过的书只是有关敦煌学的论著的一部分，但都是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故也应该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反映着敦煌学的发展足迹。所以，我也把它们收入本书。关于撰写书评，我一直认为比写论文难。好的书评，要求作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一篇出色的书评的学术价值不一定比学术论文低。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首先要实事求是，有贡献就肯定，有问题就提出商榷；其次，力图把所评之书纳入到该书所属领域的学术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最后，要争取写出一点超出所评论的书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看法。我的这些书评，都努力按这个要求去做了，但并没有完全达到我自己的要求。

当然，全面反映二十世纪的敦煌学研究，远非本书所能承担，与二十世纪敦煌学的丰富内容相比，本书的内容难免挂一漏万，我只希望能为读者了解敦煌和敦煌学提供一个简要的读本。

目 录

前言	1
一、敦煌	1
二、试论古代敦煌兴衰之因	21
三、古代敦煌文化的特点	33
四、二十世纪的敦煌学	38
五、二十世纪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65
六、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研究述评(1938—2006)	129
七、关于唐史研究者与敦煌文献研究者“分流”的问题	140
八、填补中国书法史空白,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145
九、《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读后	150
十、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 (S. 6981—13624)》	162
十一、《敦煌学大辞典》述评	174

十二、评《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經濟》	180
十三、评《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下)	190
十四、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 研究续编》	200
十五、评《敦煌本〈甘棠集〉研究》	207
十六、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214

一、敦 煌

地名。自汉至清初亦作燉煌。新莽时一度改称敦德。位于甘肃省西部偏南,河西走廊西端。北纬 $40^{\circ}10'$,东经 $94^{\circ}40'$ 。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系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在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当为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对本地区所取名字的音译,其本来涵义与译自何种语言之音莫考。

从考古发现来看,当中原夏代时,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据文献记载,约在商周时代,这里居住着羌人、乌孙人和月氏人。战国时,月氏强大,吞并了羌人。秦末,月氏又战败并逐走乌孙,独占了敦煌与整个河西走廊。汉初,匈奴打败月氏,并将其残部逐出河西。匈奴单于命其下属浑邪王驻牧敦煌一带。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河西匈奴,浑邪王率部降汉,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领敦煌、冥安等六县。为防御匈奴侵扰,汉廷在敦煌郡北部修筑了长城,与酒泉郡的长城相接。郡西部则建有玉门关和阳关,出关可通西域。两关之间也有长城和烽燧相连。敦煌成为中原通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为充实敦煌郡,汉武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

此。史载西汉末年敦煌郡已有户一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为汉人,其数量已超过原留居的少数民族,成为主体民族。他们不仅为保卫、开发敦煌提供了人力,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汉王朝组织移民和戍卒进行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使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逐渐发展为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原有的畜牧业仍占重要地位。汉廷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敦煌与酒泉、张掖、武威连成一线,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起到了“断匈奴右臂”的作用;对内保卫着陇右地区的安全,对外有力地支持了汉王朝打击匈奴、经营西域的一系列军事活动。汉廷对匈奴、西域用兵,常以敦煌、酒泉为大军的集结地和出发地,这两地还负责提供、转运武器装备和粮草。新莽末年,中原大乱,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并加强边塞防御,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内地“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敦煌得以继续发展。

东汉建立,窦融率河西归服。此时,北匈奴控制了西域。敦煌郡既担负着防御匈奴进攻的重任,还要参与对西域的一些进攻性军事活动。永初元年(107),汉廷罢西域都护。元初七年(120),又置护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治所设在敦煌。敦煌遂成为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敦煌太守实际上代行了护西域副校尉“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的职责。西域许多地方作为政治人质的王子就居留在敦煌。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在敦煌逐渐立稳了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在这个地区扎下了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典籍开始在这里传播。曾在长安师从名儒朱宠的张奂,晚年隐居乡里,传授儒学,有门徒一千多人,推动了儒学在敦煌的传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敦煌虽有近二十年没有太守,但在当地大族控制下,保持了相对平静。

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后,派兵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抑控权右,抚恤贫羸”,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反对歧视境内的少数民族,鼓励胡汉通婚;减免刑罚、徭役,鼓励百姓开荒垦田;保护来往商人,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其后,任太守的皇甫隆教民制作和使用耒犁,并推广“衍溉”法,既节省水源和劳力,又使产量大增。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的这种繁荣景象一直保持到西晋。依据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书信,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即有百家之多,反映出当时敦煌商业的繁盛。这一时期,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曹魏时,敦煌人周生烈以名儒身份参与了当时官府组织的注释经传工作。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索统、索袭、宋纤、汜腾等一批名儒。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各逞其能。二十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还发现了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开始在敦煌流行。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发掘了魏晋时期的翟宗盈墓,发现在墓门楼上有浮雕门阙和彩饰的壁画,其内容、形式、风格、技法与内地汉墓出土的壁画一脉相承,表明中原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已传到敦煌。与中原文化在敦煌扎根成长的同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据《高僧传》记载,约公元244年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三十六国语言和文字,携大量胡本佛经东归。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先随师至长安,后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加深了佛教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

政权。十六国初期,中原大乱,唯有前凉占据的河西地区相对太平,故“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其中一些人来到了敦煌,这些流民既为进一步开发敦煌补充了劳动力,又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文化。敦煌是前凉的西部重镇,担负着制御西域和沟通中西交通的重任。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前凉统治者张骏把敦煌、晋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合并为沙州,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治所设在敦煌。敦煌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杨宣在任期间,组织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前秦灭前凉,仍以敦煌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建元十八年,苻坚派吕光进军龟兹,建元二十一年徙江汉、中原百姓一万七千余户以充实敦煌。同年,前秦瓦解,吕光率军返回河西,建立了后凉。麟嘉七年(395),后凉内乱,“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其时敦煌的人口已达两万户以上。隆安四年(400),李暠在敦煌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史称西凉。西凉政权在敦煌健全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派军攻克玉门以西诸城,驻军玉门关和阳关,重新控制了西域。其时北凉、南凉在河西东部不断争战,敦煌在西凉统治下未发生大的战乱,五谷丰登,百姓乐业,成为国内名邦大郡。建初元年(405),李暠迁都酒泉,将前秦时迁来的和后凉内乱时逃来的民户全部挟往酒泉。永建二年(421),北凉灭西凉,进攻敦煌时以水灌城,城克后又“屠其城”。永和七年(439),北魏灭北凉。北凉沙州刺史沮渠无讳率残部在敦煌、酒泉一带继续抗击魏军。直至太平真君三年(442),因寡不敌众,又乏军粮,才率万余家放弃敦煌逃往西域。这些动乱都使敦煌蒙受重大损失,渐趋衰微。这一时期,中原板荡,祸乱迭生。敦煌虽亦受到影响,但在公元405年李暠迁都酒泉之前,却保持了近百年的相对太平。在此期间,不少士人携带典籍随流民逃到河西,其中一些人进入敦煌。而占据敦煌、河西的统治者都能注

意起用儒士,提倡儒学,为当地的和逃来的士人著书立说、设馆授徒提供便利。李暠还在敦煌设立官学,使敦煌产生了郭瑀、祈嘉、刘昞、索敞、阚骃、张湛、宋繇、阴兴等一批著名学者。一些在中原因战乱而失传的典籍、学说在这里得以保存、延续。后来,这些敦煌、河西学者的一些著作流传到了南朝,有些学者如索敞、江强等由北凉入北魏任官,对北魏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学说之外,道教也继续在敦煌流传,在敦煌三危山下的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五谷罐上,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铭文。此期中原地区佛教发展迅速。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不断往来于敦煌,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据 S. 797 记载,公元 406 年在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的僧人即有十二人。至北凉时,这里已是“道俗交得,多有塔寺”了。受内地禅业盛行的影响,敦煌地区出现了单道开、竺昙猷、释道法、昙摩蜜多等以修习禅定知名的高僧。修习禅定需要安静的环境,因而禅僧经常离开城市,选择人迹罕至之处开窟建寺。前秦建元二年(366),禅僧乐傅在距敦煌二十五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稍后,又“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在乐傅师窟侧,又建一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

北魏控制敦煌以后,在此设镇。仍把这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太平真君六年(445)和九年,万度归两次进军西域,西域诸国纷纷归附,丝路再度畅通。后来,游牧于北魏北境的柔然逐渐强大。到献文帝时,柔然控制了西域,敦煌又成为北魏抗击柔然的前沿阵地。敦煌镇将尉多侯、乐洛生都曾击退柔然对敦煌的骚扰。孝文帝时,进一步加强敦煌镇的守备,在此置都大将。同时,居住在阴山南北的游牧民族高车日益强盛,与柔然为敌。柔然在北魏和高车的夹击下逐渐衰落,敦煌的外部威胁得以解除。正光五年(524),敦煌镇改为瓜州。次年,北魏宗室元荣任瓜州刺史。北魏分裂后,敦煌属西魏。西魏仍以元荣为瓜州刺史。元荣死后,瓜州先后发生了邓彦和张保叛

乱,赖瓜州大族的力量,叛乱得以平息。西魏委派为民众所信服的申徽为瓜州刺史。由于此时突厥、吐谷浑分别在河西走廊以北和东南兴起,并控制了西域,申徽也只能做到保境安民而已。北周取代西魏后,仍在敦煌设瓜州,曾委任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因北周的主要注意力在统一中原,未暇西顾,敦煌未能改变防守局面。北朝时期,敦煌的佛教继续发展。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刺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兴佛事,还亲自出资在莫高窟开窟造像。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渐趋兴盛。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徒传授教义、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元荣时期开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从中原带来的文化艺术;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再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此时的敦煌石窟艺术已突破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隋初,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控制着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支游牧民族吐谷浑则占据着青海和西域南部。敦煌兵民和隋廷派来的军队一起,不断地抗击上述少数民族政权的骚扰,保卫着河西和陇右的安全。隋炀帝即位以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据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当时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这三条道路西行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随着使团和商队的出入,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达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最高统治者文帝和炀帝均笃信佛教,使用行政手段大兴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发展。仁寿元年(60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区送至敦煌“流通供养”的隋宗室成员写经,反映出这一地区的佛教在全国已占有重要地位。受内

地影响,大乘佛教思想也开始在敦煌流行。从隋代写经题记来看,此时出资写经者多为戍卒、商人和普通百姓,表明敦煌对佛教的信仰已深入到一般民众之中。与佛教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莫高窟的修窟造像活动也十分兴盛。隋代敦煌石窟艺术进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以后新的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隋末中原乱起,群雄逐鹿。敦煌归属割据河西的李轨。武德二年(619),唐廷平定河西,仍在敦煌置瓜州。但中原战乱未已,外部则有乘隋末战乱重新崛起的突厥、吐谷浑的威胁。武德三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瓜州土豪王幹斩贺拔行威归唐,唐廷改瓜州为西沙州,州治设在敦煌。另在原瓜州属下的常乐县置瓜州,设总管府,辖瓜、西沙、肃三州。武德六年,西沙州张护、李通谋反,杀害正在西沙州巡视的瓜州总管贺若怀廓,拥州别驾窦伏明为主,并派兵进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孝伦击退。不久,窦伏明率众降唐,西沙州终于最后稳定下来,贞观七年(633),唐改西沙州为沙州。在此前后,唐廷北灭东突厥,西讨吐谷浑,解除了敦煌的外部威胁,并开始进军西域。灭高昌,攻焉耆,克龟兹,设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以巩固战果。最后,又在显庆二年(657)灭掉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于是西域诸国纷纷归附,贡使通商,往来不绝。在此过程中,敦煌不仅是军用物资的转运、供应基地,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战役。此后,唐廷与西突厥余部和新兴起的吐蕃的争夺战多在西域进行,敦煌与河西成了中原王朝的“心腹”之地。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其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在敦煌和河西的其他地方,还设有赤水军、建康军、墨离军、大斗军、白亭军和悬泉、常乐、张掖、交城等守捉。景云三年(711),唐廷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地区设立了河西道,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治所设在凉州。

这是唐王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加强和安西四镇的设置为敦煌、河西经济、文化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唐廷在沙州设有健全的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推行均田制,并选择比较有作为的官吏到敦煌任地方官,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经营。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唐前期敦煌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绿洲灌溉体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积得到扩大,农业有进一步的发展,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唐廷在每年粮食收获季节向百姓和余粮食,存入粮仓,以供军需。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宝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有户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成为前凉、前秦以来敦煌户口最多的时期。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伕,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西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宝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继续经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在敦煌,既有内地来的汉商,也有西域、中亚各国的胡商。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以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组成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经过故玉北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各地来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与瓷器,西域的珍宝、特产,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祠。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

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当时沙州城内建有州县两级学校,设有经学、医学、道学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规定的儒道医等汉文化典籍。此外还有不少私人学校,亦以教授儒家典籍为主。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官私学校或学生使用的各种写本汉文化典籍。与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关,敦煌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设立了道学,写本道经也大量涌现,道观增多,反映出道教曾盛极一时。佛教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敦煌遗书写经题记来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当地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从、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尽管唐统治者在这一时期不时抬高道教地位,贬抑佛教,敦煌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佞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导下,一直缓慢而平稳地向前发展。见于记载的佛寺比前代增多,莫高窟的开凿活动也一直在持续。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继续不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在河北发动叛乱,唐廷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锐部队入援,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随后,又由东向西进攻河西。广德二年(764),攻占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奔甘州;永泰二年(766),又连克甘、肃州,继杨志烈为河西节度使的杨休明被迫移节沙州;大历十一年(776),攻陷瓜州,并在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城。直至贞元二年(786),敦煌城内矢尽粮绝,敦煌人才在得到吐蕃“毋徙它境”的承诺后,与其结盟而降(吐蕃陷沙州

城时间,尚有贞元三年、建中二年等诸说)。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管辖时期。吐蕃统治者废除了沙州的县乡里等各级行政机构。在沙州之下设“部落”,部落下设“将”,“将”为基层行政机构。“将”设“将头”,“部落”设“部落使”,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隶属于瓜州节度使。在经济方面,推行计口授田制,改行新的赋税制度,即按地亩征收“地子”和按户征收“突税”。这两项负担大大超过了以前唐政府对百姓的征收数额。在交换领域,废除唐币,实行实物交换。还要求当地汉族改变原有习俗,实行“胡服辫发”。广泛推行吐蕃语,禁用唐年号,改用地支纪年。这些做法严重阻碍了沙州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敦煌失去了往日的殷富与繁华,不断激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反抗。吐蕃统治者除了依靠吐蕃军和吐蕃化很深的“通颊部落”对当地居民各种形式的反抗予以坚决镇压以外,还任用一些投靠他们的汉族世家大族成员为各级官吏,以缓和民族矛盾。并大力扶持佛教,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水碓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十三所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由三百一十人增加到近千人。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领为僧统,后又改称教授。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碾碓、油坊、牲畜、车辆及依附人口——寺户。并通过放高利贷盘剥普通百姓。译经活动频繁进行。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进行翻译。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兴盛。每所寺院都有专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都定期开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寺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